

## 明代宦官與鄭和下西洋的關係\*

陳學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明代自太宗(成祖, 1402–1424 在位)永樂三年(1405), 至宣宗(1425–1435 在位)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間, 七次遣派龐大艦隊出使西洋諸國通番取寶, 從福建下海至中南半島、印度, 又越洋至波斯灣、阿拉伯半島以至非洲東岸, 所到達四十國, 其首次航行較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之遠航發現新大陸更早八十餘年, 而規模過之, 誠為人類海洋探險的歷史盛舉。歷次下西洋, 人所周知, 是由「三保太監」鄭和(1371–1433)及王景弘(原名王貴通, 詳下)為首的宦官同僚所策畫領導。現存的太宗及宣宗所賜下西洋的敕書, 都分別書作「太監鄭和」或「內官鄭和」, 而《明太宗實錄》永樂三年六月己卯記首次下西洋以「中官」稱之:「遣中官鄭和等賈勅往諭西洋諸國。」其義皆為內侍閹寺。《明史·宦官傳》置鄭和於卷首, 並言「〔永樂〕三年六月, 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sup>1</sup>

自 1904 年梁啟超(1873–1929)發表〈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 首開風氣, 近半世紀以來, 下西洋的研究成為顯學, 論著接踵不輟。2005 年出版朱鑑秋編的《百年鄭和研究資料索引》收錄論文分二十項, 包括(一)鄭和及下西洋總論、(二)鄭和身世、(三)下西洋諸論、(四)船舶及造船、(五)航海圖及航海技術、(六)起航地及出海處、(七)航行區域及所經地方、(八)對外關係、(九)經濟貿易、(十)文化、科學、(十一)軍事、(十二)宗教、(十三)隨員、(十四)史料研究、(十五)史跡文物、(十六)中

\* 本文初稿曾在 2005 年 7 月 12 至 15 日於香港大學中文系及香港歷史博物館主辦之「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主辦單位並無出版研討會論文集。

<sup>1</sup> 有關敕書見鞏珍:《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 1961 年), 頁 15–16。參徐玉虎:〈明鄭和下西洋「敕書」之詮釋〉, 載所著《明鄭和研究》(高雄:德馨室出版社, 1980 年), 頁 130–40。其他引文見張輔(監修):《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62 年), 卷四六, 頁 650;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1975 年), 卷三〇四〈宦官傳一〉, 頁 7766。

西比較、(十七) 現實意義、(十八) 研究述評、(十九) 鄭和航海新論、(二十) 文藝。每項又分子目，網羅大小論文逾千篇，顯示各界學人的關注和歷年的成績。<sup>2</sup> 論者大概以為，鄭和及其主要隨員人皆知為宦官，無需凸顯闡寺作專題研究；但事實上，明初的宦官組織及其權勢對下西洋事業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要深化研究，這個問題便需重新考慮。

本文鉤勒有關宦官下西洋的記載，對一些關鍵問題深入考究，包括宦官出使外國的先例、永樂帝任命鄭和等為統帥的原因、下西洋基本資料的貧乏與宦官行動守秘的關係、艦隊稱為「寶船」如何反映下西洋的目的、宦官的主導及組織與下西洋通番取寶的特色、鄭和與王景弘兩人事跡的一些考證及其他雙統帥的領導才能的比較，以及宦官擅權對當世及後代有關下西洋事業的認知的影響，希望能提出若干答案為博雅學者參考。

## 二

首先，宦官的崛起和形成勢力，傳統的說法是始於永樂帝。《明史·宦官傳》云：「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其實，根據洪武十四年(1381)頒佈的《祖訓錄》及二十八年(1395)增修的《皇明祖訓》，太祖朱元璋(1368-1398 在位)時代內廷已建立九倉、二庫、六局的宦官機構，末年更擴大成二十四衙門，延用闡寺為皇帝及皇室提供各種服務。宦官衙門以司禮、內宮、御用、尚膳諸監最為重要，而內使中不少為非漢民族，如蒙古、女真、高麗、安南等等。洪武初年太祖管制宦官甚嚴，規定不得兼外臣文武銜，官階不得過四品，又

<sup>2</sup> 朱鑑秋：《百年鄭和研究資料索引(1904-2003)》(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此書為江蘇省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籌備領導小組主編的《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系列叢書》之一種，以下省稱《資料索引》。歷年學者對鄭和研究的簡介見黃慧珍、薛金度：〈鄭和研究八十年〉，載《鄭和研究資料選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頁1-19；王天有、萬明(編)：《鄭和研究百年論文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前言〉；范金民：〈20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載《資料索引》，頁324-57；韓勝寶：《鄭和之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及林曉東(編)：《鄭和下西洋與華僑華人文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年)所收錄有關論文。臺灣學者對鄭和研究的評論見鄭梓：〈「鄭和下西洋」史事的虛擬與實境——以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鄭和熱」為中心剖析〉，載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年)，頁21-40；對此文之評論見同書頁345-50。英文評論見Geoff Wade, "The Zheng He Voyages: A Reassessment,"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8, pt. 1 (2005), pp. 37-58。最新對鄭和下西洋性質較客觀的全面檢討為徐泓：〈鄭和下西洋目的與性質的回顧〉，《東吳歷史學報》第十六期(2006年)，頁25-51。

嚴禁宦官干預政事，曾立一鐵牌於內宮，揚言：「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但是由於實際需要，閹宦已逐步從內廷的侍從，以皇帝代表身份參與外廷的事務，特別是在與皇權及利益有密切關係的領域，如軍政、外交、祭祀和財政等等，擔任主管或監督。由於身份及權力來源關係，宦官行事隱秘，只向皇帝負責，不為外廷知悉或監管，因此坐擁大權。到後來燕王朱棣（1360–1424）以「靖難」為名起兵，得到閹宦的幫助篡奪建文（1398–1402 在位）帝位，登基開元永樂，便廣泛利用宦官為私臣，作為皇權的羽翼，由是愈更擴展其在外廷的活動及權力。<sup>3</sup>

太祖登基後，以「四夷來貢者不拒，不來不究」的原則，頻繁發展與外國交通，很早就以宦官處理外番朝貢貿易等事務。這些任務主要見於兩方面，其一是主持市舶司。市舶司既是負責朝貢貿易的機構，又是明代一外交機構。據記載洪武初年已設市舶司於太倉黃渡，有提舉司其事，而以閹宦充當職務，其後增設於寧波、泉州及廣州等地。永樂元年（1403），太宗「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自此為宦官管制市舶打開大門。其二是以宦官直接出使外國，充當朝廷使者，職務包括冊封與弔祭番王，迎送和陪同外國使臣，冊封山川，頒賜賞物，求索「火者」（閩人）與「藩妃」及各種貢物等等。同時，由於外國使節及番王陸續來朝，官方在他們登陸地點，如設有市舶司的福建、浙江及廣東等口岸設置驛館特別招待，亦多以宦官職司其事。明初為何選用閹宦充當外交事務？論者以為這是由於通番貿易與皇帝利益密切，宦官為內廷私臣，可以守密隱秘，不易洩露為外廷朝臣知曉之故。況且，宦官甚多為非漢民族，通曉外語，委之出使在溝通方面有實質的幫助。<sup>4</sup>

明初宦官出使外國事例甚多，早在洪武二年（1369），即以原朝鮮籍宦官金麗淵出使高麗；八年（1375）以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十一年（1378）遣陳能往安南弔祭國王；十五、十六年（1382–1383）先後遣奉御路謙、監丞梁珉出使琉球；十九年（1386）命內使隨行人劉敏等齎磁器往賜真臘國王，而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間（1393–1398），又屢屢遣派原朝鮮籍的閹宦如黃永奇、崔淵、鄭澄、陳漢龍、金希裕等往使其國，及遣內使趙達與朱福等出使暹羅斛國等。永樂帝早年已大量遣派宦官

<sup>3</sup> 有關明代宦官的學術著作甚多，本文參考的包括黃彰健：〈《論皇明祖訓錄》所記明宦官制度〉，載所著《明清史研究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1–30；王春瑜、杜婉言合撰二書：《明代宦官與經濟史料初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明朝宦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衛建林：《明代宦官政治》（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增訂本）等。英文著述則有 Henry Shih-shan Tsai,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sup>4</sup> 參考孫衛國：〈論明初的宦官外交〉，《南開學報》1994年第2期，頁34–42；何偉幟：《明初的宦官政治》（香港：網上電子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頁79–80，151–56。又見後書附錄二〈永樂年間宦官出使表〉，頁328–41。又參 Tsai,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Chap. 6 “Eunuchs and the Ming Diplomacy”。

出使，在鄭和之前有永樂元年侯顯至烏斯藏，黃儼二度至朝鮮，馬彬出使爪哇、蘇門答臘，李興至暹羅，尹慶至滿喇加、柯枝，原朝鮮籍的韓帖木兒至朝鮮；而二年（1404）又遣楊真童至孟定、木邦，韓帖木兒再往朝鮮，朱信至日本，劉璟使朝鮮等。黃儼、韓帖木兒及江保、王安、李謙等都是燕藩從龍之士。因此，鄭和之獲欽命奉使西洋，除卻本身是雲南回回（Muslim）望族的後裔和燕邸寵信的宦官，又具有歷史的原因。<sup>5</sup>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原始資料，根據鄭鶴聲、鄭一鈞編的《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所輯錄，包括皇帝的敕書、出洋奉使留存的碑刻，如〈南京弘仁普濟天妃宮碑〉、〈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跡碑〉、〈福建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等；隨行的通譯馬歡、費信及鞏珍分別撰寫的記錄如《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三書；及倖存的「水程」記錄如《鄭和航海圖》、《順風相送》等。至於鄭和家世的資料，則先有 1913 年袁嘉谷發現永樂禮部尚書李至剛（1358–1427）撰鄭和父之墓碑〈馬哈只碑銘〉（錄於《滇繹》），由是知原姓馬，鄭為賜姓，其後又得雲南玉溪鄭和後裔所藏的《鄭和家譜》，李士厚隨於 1937 年出版《鄭和家譜考釋》。譜牒資料續有發現，中國航海史會為紀念下西洋五百八十周年所編纂的《鄭和家世資料》一書，收錄《鄭氏世系家譜》，及其上代的《賽氏總族牒》、《賽典赤家譜》與後出的《馬氏家乘》，但是內容駁雜，需仔細考證，對於鄭和的事跡，仍然不出〈馬哈只碑銘〉。<sup>6</sup>

<sup>5</sup> 以上史料皆出《明太祖實錄》及《朝鮮李朝實錄》。後者參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一冊；又參何偉幟：〈永樂年間宦官出使表〉，頁 328–41。

<sup>6</sup> 鄭和下西洋的原始資料初步介紹見向覺明（達）：〈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小說月報》第一號（新年號）（1929 年），頁 47–64。詳見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第十九章〈有關鄭和下西洋書題解目〉。鄭書分上、中（上下二冊）、下三冊（先後於 1980、1983、1989 年出版），近二百萬字。敕書及碑刻的簡介見徐玉虎三文：〈關於鄭和的幾種碑刻〉，載《明鄭和之研究》，頁 100–129；〈明鄭和下西洋「敕書」之詮釋〉，載同書，頁 130–50；〈鄭和下西洋於諸番國勒石立碑新考〉，載王天有、徐凱、萬明（編）：《鄭和遠航與世界文明：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8–96。鄭和的譜牒資料見李士厚：《鄭和家譜考釋》（昆明：作者自刊，1937 年）；及紀念偉大航海家鄭和下西洋 580 周年籌備委員會、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編）：《鄭和家世資料》（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瀛涯勝覽》及《星槎勝覽》皆有英譯：J.V.G. Mills, trans.,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Mills, trans., Roderich Ptak, rev. and ed., *Hsing-Ch'a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Star Raft*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1996)。《瀛涯勝覽》今有萬明新校注之《明鈔本〈瀛涯勝覽〉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年）。

最令人詫異的，是官史如《太宗實錄》及《宣宗實錄》對於一代大事的記錄極為簡略，對七次下西洋的出使及回程的年月記載均有缺漏錯誤（《明史》因襲其失誤），學者需從《瀛涯勝覽》等三書、出土碑刻墓銘及後人雜著如陸容（1436–1497）《菽園雜記》、祝允明（1461–1527）《前聞記》等雜著的記錄比勘考證始能訂正。事實上，官書及同時人的著述，對歷次出洋的情況，除卻在人員、「寶船」數目、水程、所到各國及在旅途發生的大事，與所攜回的珍貴奇異貨物方面作籠統的報導，並無記載具體的情況。例如，關於出洋帶備的錢銀物資的種類數量，在官府倉庫以外從何處徵集物料，南京龍江及閩省船廠造船的情況及耗費（前者雖有嘉靖李昭祥的《龍江船廠志》傳世，但對永樂時期造船並未提供史料），攜回的珍寶奇異貨物在返回本國港口後如何處置，何者運回京師納入內廷倉庫等等經濟管理問題，官方記載一片空白。何故有此情況？<sup>7</sup>

依筆者管見，下西洋基本史料匱乏，與宦官主導其事有直接關係。宦官為皇帝私臣，奉聖旨行事，其出洋舟師的組織、船舶的製造、官軍兵卒的徵召，以至各樣物資錢銀的彙集，都是鄭和及其僚屬根據敕諭，逕行往內廷各官庫或地方有司領取。回程時所獲外國諸番的進獻，或透過種種途徑取得的珍寶方物，亦都直接由宦官處理。宦官這些活動，本身有無貯存檔案記錄不得而知，就算存在，由於這些冊牘屬於內廷秘藏，不會流出宮外，所以朝廷各部衙門亦無記錄，更無編製成冊為史館修纂國史採用。這是下西洋事業基本資料短缺的主要原因。事實上，宦官出使的記錄在官史如《明實錄》亦十分簡略，唯一詳細的記載，則是大量載錄明朝宦官出使朝鮮，不少是原籍朝鮮的「還鄉」宦官使者的《朝鮮（李朝）實錄》，對國史有重要的補充。<sup>8</sup>

此外，論者又以為下西洋資料短缺，係由於宣德五年（1430）編成的太宗及仁宗（1424–1425 在位）《實錄》的文臣，如夏原吉（1366–1430）、楊榮（1371–1440）、楊溥

<sup>7</sup> 《太宗實錄》及《宣宗實錄》中記載下西洋經過的輯錄見趙令揚、陳學霖等（編）：《明實錄中之東南亞史料》（香港：學津出版社，1968 年〔上冊〕、1976 年〔下冊〕）。陸容及祝允明所記下西洋資料見《菽園雜記》，《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卷三，頁 23；及《前聞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頁 72–75；李昭祥：《龍江船廠志》，收入鄭振鐸（編）：《玄覽堂叢書·續集》（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1947 年），第一一七至一一九冊。鄭和歷次下西洋的錢銀耗費數字僅見王士性《廣志鐸》卷一：「國初府庫充溢，三寶鄭太監下西洋，齎銀七百餘萬，費十載，尚剩百萬餘歸。蓋乘元人所藏，而元時不備邊，故其充溢至此。」收入周振鶴（編）：《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243。資料根據不詳。

<sup>8</sup> 有關記載參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各冊。又見陳學霖三文：〈永樂朝宦禍舉隅——黃儼出使朝鮮事跡綴輯〉，載所著《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29–89；〈洪武朝朝鮮籍宦官史料考釋〉，載所著《明代人物與史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77–124；〈海壽——永樂朝一位朝鮮籍宦官〉，載同書，頁 125–66。

(1372–1446)、楊士奇(1365–1444)等，以鄭和通番取寶事違悖太祖《祖訓》「不征諸夷國」的外交政策，並不視為「盛事」，刻意將有關記載簡略及淡化。按《祖訓·首章》的有關政策言：「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命。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今將不征諸夷國列於後。」永樂帝遣鄭和出使西洋諸國，雖云詔諭君臨天下，敷宣教化，推動朝貢貿易，但數度與各地番王兵戎相見，顯然違背太祖的訓示。永樂藉《祖訓》「法祖」的原則，以「靖難」清君側藉口起兵推翻建文帝繼嗣太祖，非常重視其言行與《祖訓》的符合，以維護其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宣宗的史官既不贊同永樂帝的政策，又要維護其「法祖」的政治行為，對此違悖《祖訓》的通番取寶大事唯有輕描淡寫作為交代，這當可解釋為何太宗及仁宗《實錄》對鄭和下西洋事只有簡短片斷、殘缺不全的記載。<sup>9</sup>

至於後來雜著罕見下西洋的資料，前人懷疑係由於檔案遺失之故。此首見萬曆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古里〔Calicut〕」條：「仁宗即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德中復開，至正統初復禁。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1421–1502〕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1437–1516〕所匿。忠詰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臺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也。舊案雖存，亦當燬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項忠後人項德楨編《項襄毅公年譜》（萬曆二十六年〔1598〕序刊本）亦有一段類似文字，收錄於李贄（1527–1602）《續藏書》之〈項襄毅公傳〉。傳云：「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為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且亦萬計，此一弊政，牘即在，尚宜燬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此處言王三保指王景弘，與前條異，但內容似出同一史源。劉大夏從曾孫劉世節於明末編的《劉忠宣公年譜》繫其事於成化九年（1473），亦言中官所索的是「宣德間王三保的出使西洋水程」。

<sup>9</sup> 此處參考許振興：〈《皇明祖訓》與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2005年7月12–15日。《祖訓》「不征諸夷國」條見《皇明祖訓·首章》，載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390。有關永樂帝藉繼承《祖訓》以維護其政權的合法性，參王崇武：《明清難史事考證稿》（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年），第五章。關於《太宗實錄》及《仁宗實錄》的編纂，詳謝貴安：《明實錄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1–33，207–18。

稍後，顧起元(1565–1628)《客座贅言》「寶船廠」條又補充說：「舊傳冊在兵部職方。成化中，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遼絕耳目之表者。所徵方物，亦必不止於蒟醬、邛杖、蒲桃、塗林、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纂寂寥，莫可考驗，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無復可紀。惜哉！其以取寶為名，而不審議於《周官·王會》之義哉！」近人多輕信，認為鄭和檔案因此被焚燬而失傳。不過，時人王宏凱及蘇萬祥撰文駁斥，認為此事既不見官書或事主的志傳，百年後始冒出，真實性極其可疑；況且，劉大夏時為車駕司郎中，何能擅入兵部職方司內庫，匿藏如此重要的鄭和出使水程檔案，甚不合情理。又指出《鄭和航海圖》很可能就是藏於該庫的下西洋水程的一種，能夠流傳至今，足以說明檔案未被焚燬，因此認為此事很可能是後人因劉大夏曾匿藏永樂間征安南的檔案而附會，應以傳聞看待。職是之故，此故事不足解釋鄭和下西洋資料的貧乏。事實上，如前所言，基本資料的缺乏，皆因主持其事的宦官並無留下有關檔案，就算有記錄，亦因為其事屬於內廷事務，無須傳布於朝廷有司的原故。今日流通的惟有「出使西洋水程」一類記載，上述二書言中官要向兵部索取鄭和或王三保的出使水程，如果屬實，亦間接說明內廷並無留存下西洋的檔案。<sup>10</sup>

### 三

從永樂三年至十九年(1421)，太宗六次派遣鄭和及王景弘等親信宦官為正副使，率領龐大舟師出訪西洋諸番國，而宣宗宣德八年接踵，遂成明代七下西洋的舉世壯舉。歷次的主要領導都是各級宦官，鄭和及王景弘為正使太監，隨從的有副使監丞、少監、內監，每次數目不一，其下始為武官如都指揮、指揮、千、百戶，文官如舍人、郎中、通事(譯員)、序班、陰陽、醫官，以及航海(時稱「火者」)、船舶修造技工，及醫務人員以至各級兵卒，其首次出洋人員共二萬七千餘人之多。由此可見，歷次出使皆為宦官所策畫領導，直接隸屬於皇帝的內廷事業。鄭和及王景弘皆為四

<sup>10</sup> 有關資料見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八，頁307；李贄：《續藏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一六，頁323–24；顧起元：《客座贅言》(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一，頁31；劉世節：《劉忠宣公年譜》，《劉忠宣公遺集》附，《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六輯影印清光緒元年(1875)劉乙燃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一，頁六上。劉大夏傳記見《明史》，卷一八二，頁4843–49；Ray Huang, “Liu Ta-hsia,”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下稱 *DMB*),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1, pp. 958–62。時人研究見王宏凱：〈劉大夏焚燬鄭和出使水程質疑〉，《鄭和研究》第6期(1988年5月)，頁49–53；蘇萬祥：〈鄭和下西洋檔案為劉大夏焚燬質疑〉，《鄭和研究》第11期(1990年11月)，頁39–43。

品太監，記載雖然列景弘於鄭和之後，但二者同為正使。《明史·鄭和傳》言「〔永樂〕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儕」字文義為「等」，說明二者同一等級，地位相埒，但近人多忽視其意，誤稱王景弘為副使。歷次出洋，在鄭和及王景弘之下的高階宦官不少還可稽考，如侯顯、洪保、楊慶、楊敏、李興（愷）、朱良、周滿、楊真、張達、吳忠等等。<sup>11</sup>

至於永樂帝差遣使者下西洋的動機和任務，包括永樂三年首次出使，官書碑刻並無明言，大多但書遣使賈捧詔敕，往海外番國詔諭君臨天下，敷宣教化，並賜諸國王金織文綺彩絹有差等官樣文詞。例如永樂七年（1409）皇帝敕諭〈四方海外諸番王及頭目人等〉便言：「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致失所。今遣鄭和賈敕，普諭朕意：爾等祇順天道，恪遵朕言，循理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摠誠來朝，咸錫皆賞，故茲敕諭，悉使聞知。永樂七年三月□□日。」同時，又敕諭〈南京守備駙馬都尉宋彪、襄城伯李隆〉：「今遣太監鄭和，往西域忽魯謨斯等國公幹，合用槓檣搬運錢糧官軍，爾等即便照數差撥，勿得稽延，故諭。永樂七年三月□日。」因此，學者需悉心鉤稽載籍，爬梳記載，就明代當時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形勢，以及對外番的朝貢貿易關係仔細研究，始能對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這些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和結論。《明史·鄭和傳》稱「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由是遂派鄭和七下西洋，係受明人盛傳建文帝在燕王「靖難」成功後，「遜國」出亡說的誤導，一般學者對此皆深表懷疑不予接受。<sup>12</sup>

其實，下西洋的主要動機及宦官的任務，從出洋艦隊之命名為「寶船」可窺見一二。「寶船」有二義，狹義指第一等船，其次稱馬船、糧船、坐船、戰船等等；廣義則為下西洋船舶的統稱。關於「寶船」一詞的解釋，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官司志》「寶船廠」條下說：「洪武永樂中造船入海取寶，該廠有寶庫關。」《明史·鄭和傳》載云，「〔奉使〕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同書〈西域傳·坤城〉則稱之為

<sup>11</sup> 詳細資料載《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第六章。

<sup>12</sup> 永樂七年皇帝敕諭見〈鄭和世系家譜〉，載《鄭和家世資料》，頁2。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任務論著甚多，不勝枚舉，詳《參考資料》，頁67-72；又參韓勝寶：《鄭和之路》，頁125-36。鄭和下西洋為尋訪建文帝說源於《明史·胡濙傳》載永樂帝懷疑惠帝出亡，命戶部給事中胡濙（1375-1463）遍行各地尋訪：「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偏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二十一年還朝，……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謫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卷一六九，頁4534-35）有關傳疑惠帝出亡與下西洋關係的記載，參徐玉虎：〈鄭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載《明鄭和之研究》，頁6-12；又詳《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頁890-903。

「西洋取寶之船」，文義最為明確。<sup>13</sup> 故此，四方的奇珍異寶或是中土稀有的貢物，都是下西洋獵取的對象，而此類寶物，向為內官所主管以備人主玩覽，或視為祥瑞之徵，而更重要的是增加財富。職是之故，不論是皇帝主導，或是宦官以取寶打動人主下西洋之心，宦官對寶物的獲取和監管，無疑是出洋通番的重要任務。因此，從西洋番國所得的貨物，首先由宦官就地檢驗然後挑選押運回京，外界不知詳情，只有從隨行的記載，或後來從宮中露出的信息始略知一二。

永樂宣德間為翰林侍講的劉球（1392–1443），曾在所撰的〈送禮部員外沈君還南京序〉描述宮廷寶藏的來源說：「聖天子德加海外，間遣中貴人摠甲士，帆大舶穹艦道海洋，抵暹羅、阿丹、爪哇、滿刺加、古里、蘇門、天方、真臘、錫蘭山諸國，收其所謂麒麟、福鹿、獅、虎、象、犀諸異獸，駝雞、鷓鴣、墩鐸、鶯哥諸珍禽，金、砂、珠、香、翠、貝、齒、角，與凡彼產所有，此蓄所無之奇貨以入中國，以為苑囿之寶，府庫之藏，器玩服飾之用。」<sup>14</sup> 這裏說明當時北京苑囿的異獸珍禽、貯藏內庫的珍寶，以及宮中的器用服飾上鑲的珠玉寶石，大部份都是鄭和下西洋搜集而來。當日官員究竟如何取寶，據馬歡《瀛涯勝覽》的記載，主要有三種途徑：首先是通過買賣方式，獲得大量寶物；其次是通過買賣交換，又獲得不少珍寶；再其次則通過採集方式，亦獲得當地的稀奇天然物質。此外，復從番王的各別奉獻和來朝貢使所呈送的獲得不少寶貨。這些寶物的數量和價值無法估計，但據時人田培林的推算，鄭和下西洋所獲財富的數量，「至少有金二三十萬餘兩，白銀千餘萬兩，大大超過宋元時期市舶收入的十數倍」。至於所獲寶物財富是否只供皇室享受，或惠及大臣官員，或將部份撥入國家府庫以應付額外財政開支，而歷次出洋以各種方式向番國取寶，能否視為國際貿易的雛型？這些都是研究鄭和下西洋的社會經濟意義的學者所關注但難作結論的問題。<sup>15</sup>

宦官不但主導航海通番，而檢驗艦隊回國所搜集的貨物，或處理回國後的舟舶亦歸宦官處理，地方官不得干預。現存兩則資料略見大概。其一見蘇州知府況鍾

<sup>13</sup> 見李昭祥：《龍江船廠志》，卷三，頁九下；《明史》，卷三〇四，頁 7768；卷三三二，頁 8626。參包遵彭：《鄭和下西洋之寶船考》（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1年），頁 29–30。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船舶及造船的論著詳《參考資料》，頁 84–97；又參韓勝寶：《鄭和之路》，頁 39–49。

<sup>14</sup> 見劉球：《兩谿文集》，《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卷八，頁一六上至一七下。參田培棟：〈鄭和下西洋的性質與所獲財富的統計〉，《鄭和研究》第 9 期（1989年 12 月），頁 22–25。

<sup>15</sup> 見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錫蘭國」、「柯枝國」、「祖法兒國」、「阿丹國」、「天方國」條。參田培棟：〈鄭和下西洋取寶考實〉，《鄭和研究》1994年第 1 期，頁 4–6。有關經濟貿易問題的討論，詳《參考資料》，頁 158–67；又參韓勝寶：《鄭和之路》，頁 97–123。

(1383–1443) 在宣德八年五月十五撰的〈留官賑飢辦差奏〉：「現奉勘合西洋寶船回還，蒙差太監王謹等前來封船，正在嘉定地方寶山劉家港停泊封船。」王謹初名陳蕪（卒於 1451 年），原籍安南。葉盛（1420–1474）《水東日記》記其事跡云：「御用太監陳蕪，交趾人，永樂丁亥〔五年（1407）〕入內府。宣廟為皇太孫，蕪在左右。既御極，即升太監，賜姓名曰王謹，字潤德，……〔盛〕嘗記童時蕪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處記時為知府的況鍾負責勘合西洋寶船回還，但是封船的是太監，可見太監權力之大。另一記載見（釋）至全撰〈大明故司禮太監興公（安）之碑〉：「甲寅歲〔宣德九年（1434）〕，太監王景□〔弘〕等□□□貨寶來歸，公奉命往視□□□物。」興公指興安（1389–1459），資歷較王謹為淺，其時為長隨奉御，當時諒為王謹隨從，在封船後往視察帶返貨物。

按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詳載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日程，從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六日於南京開舡，至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進太倉，七月六日到京，十一日關賜獎衣寶鈔，則王謹及興安等當於到太倉封船後隨同寶船返京（按：鄭和是年初卒於古里，則其寶船可能攜回遺骨，故此特別關注，詳下），並以欽差身份在南京代皇帝行賞賜。<sup>16</sup> 王謹、興安兩位都是恩幸的安南籍宦官，差遣他們處理這類任務，無疑是由於其特殊的背景。以宣德時的情況推測，永樂時西洋寶船回還諒亦先由宦官欽差清理帶返貨物，然後運回京師倉庫儲藏。這些取寶的事情，外間雖不知實況，但顯然在內廷流傳。例如《英宗實錄》記載天順二年（1458）二月戊申，司禮監太監福安以缺少黃金製造宮廷飾物上奏，言「永樂、宣德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亢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缺，請遣返內官於雲南等處出官庫銀貨收買。上納。從之」，<sup>17</sup> 便足為往昔下西洋索寶為宦官的重要任務的注腳。由於宣德以後再無下西洋，只好改從雲南出官銀收買所需黃金。

#### 四

永樂帝遣派鄭和與王景弘為下西洋的統帥，固然因為他們是寵信的藩府宦官，而本身亦具備優秀的條件。鄭和在明代載籍的資料雖然不多，但是近世由於其父〈馬公墓誌銘〉，及其家族譜如《鄭氏世系家譜》，其上代的《賽氏總族牒》、《賽典赤家譜》與《馬氏家乘》等陸續出現，內容豐富，對鄭和的姓氏、家世及出身已有具體交代。因

<sup>16</sup> 以上見況鍾：〈留官賑飢辦差奏〉，載《明況太守龍岡治蘇政績全集》，乾隆二十九年（1764）刊本，卷一〇，頁一〇下；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卷三四，頁330–31；梁紹傑（輯）：《明代宦官碑傳錄》（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97年），〈大明故司禮太監興公（安）之碑〉，頁71–72；祝允明：《前聞記》，頁72–75。

<sup>17</sup> 見孫繼宗（監修）：《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3年），卷二八七，頁10上。

此上世紀以來有關鄭和傳記的專著源源不絕，而近年的著作越更翔實豐富多元化。<sup>18</sup> 但是王景弘因為資料比較稀少，而由於改名，史家誤以其前後名為二人，所以其下西洋事業並不顯彰。筆者年前撰作〈明王景弘下西洋史事鉤沉〉，考定永樂七年二月隨鄭和第三次出洋，在錫蘭島（今斯里蘭卡島）豎立佈施碑之王貴通即仁宗以後之王景弘。由於宣德時王貴通之名已為王景弘取代，史家多以王貴通為永樂時另一使者。若將兩者的記載合併，資料便很完整，可與鄭和的功業作一比較。2002年及2004年福建省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中心與漳平市王景弘研究會兩度聯合召開下西洋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對王景弘的籍貫、生平事業及歷史貢獻都有重要闡發。<sup>19</sup>

由於新資料的發現，鄭和的家世已比較明朗。近人根據《鄭氏家譜》及永樂禮部尚書李至剛撰〈馬哈只碑銘〉及《賽典赤家譜》等記載，考證鄭和為出自天方國（阿拉伯）的回回賽典赤（Saiyid Ajall）家族的後裔，元朝敕封為咸陽王的賽典赤·瞻思丁（Saiyid Ajall Šams al-Dīn, 1211–1279）的六世孫。但是譜牒資料駁雜附會，記載不完全可靠，因此鄭和是否為瞻思丁的後裔仍可商榷。根據〈馬哈只碑銘〉，和的曾祖為拜顏，祖哈只，父改姓馬氏，名哈只（1344–1382），皆襲爵，世為雲南昆陽州人，因此是出身信奉伊斯蘭教的雲南回回望族。馬哈只有子二人，長文銘，次和。〈碑銘〉

<sup>18</sup> 根據《資料索引》，頁1–22，自1904年梁啟超發表其〈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開始，百年來國人撰作以鄭和為題的傳記論著凡數十種，其有時代代表性的包括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上海：中華書局，1948年）；朱楔：《鄭和》（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徐玉虎：《鄭和評傳》（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年、1985年）；張維華（主編）：《鄭和下西洋》（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孔令仁、馬光汝等：《令哥倫布黯然失色的大航海家》（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張研：《鄭和下西洋》（臺北：雲龍出版社，1992年）；謝方：《鄭和》（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楊軍、楊明：《鄭和大傳》（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范金民、孔令仁等：《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年）；鄭一鈞：《鄭和全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等。外文則有寺田隆信：《中國の大航海者鄭和》（東京：清水書院，1981年）；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此書有邱仲麟翻譯，題名《當中國稱霸海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Dominique Lelièvre, *Le dragon de lumière: les grandes expéditions des Ming au début du XV<sup>e</sup> siècle* (Paris: France-Empire, 1996)；及Edward L. Dreyer, *Zheng He: China and the Ocea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405–1433*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7)等。

<sup>19</sup> 筆者此文原刊臺北《漢學研究》第九卷第二期（1991年），頁223–56；後來修訂改題〈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收入《明代人物與傳說》，頁223–56；其後又重刊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漳平市委員會（編）：《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漳平文史資料》總第27輯（2003年），頁223–56；又收入福建省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中心、漳平市王景弘研究會（編）：《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頁111–56。此二書為二次研討會的論文選集，承李金明教授遠道惠寄其私人藏本供參考，謹此致謝。其他有關王景弘的論著參《資料索引》，頁188–90。

記載馬氏父子的事跡甚簡略，對於次子僅言：「和自幼有才志，事今天子，賜鄭，為內官監太監。賦性公勤明敏，謙恭謹密，不避勞勤，縉紳咸稱譽焉。」後又言：「公次子和，才負經緯，文通孔孟，特選於〔皇廷〕，敕諭於諸番國並海外公幹教化。諸番王等無不祇順，共皆仰體皇仁，恪遵敕諭，摠誠來朝。」此誌書於鄭和發跡之後，語多諛詞，並無透露其早年經歷及如何見知於永樂帝。

今據《家譜》及主要記載，和係於洪武十四年，大將傅友德、藍玉等征討雲南（時尚未歸入版圖）與眾幼童被擄入軍中，時年十歲上下，未幾送往南京閹割。到十七年（1384），傅友德等率軍隨宋國公馮勝往北平受燕王節制，和始入燕王藩邸，時稱三保，從王巡守北陲，防範蒙古。建文元年（1399），燕王起兵「靖難」，和隨軍有功。王登基後開元永樂。二年，御書「鄭」字賜以為姓，乃名鄭和，選為內官監太監。三年，委任為下西洋的全權統帥。據近人考證，和於建文元年十月保衛北平時，在外圍鄭村壩大敗來攻之李景隆軍，其賜姓鄭出此。至於賜姓應在永樂元年，因為下揭姚廣孝（釋道淵，1335–1418）於是年為鄭和刊刻的《佛說摩利支天經》題記，已書其鄭姓及法號「福善」。又由於其名三保（「保」又作「寶」），因此在宣德後有「三保（寶）太監」之號。至於「三保」之義則眾說紛紜，有謂「三保」為民間俗名，有謂係蒙元對奴隸的稱號，而「三寶」則出佛教對佛、法、僧的尊稱，莫衷一是。<sup>20</sup>

關於鄭和的生平，由於缺乏具體資料，仍有若干爭議。最主要的如他究竟生於何年，因為馬哈只的〈墓誌銘〉並未記載，長期以來史家但據明朝大軍入雲南，其子被擄入軍中，年在十齡左右被閹割往前推算，迄今尚未達到結論。吳晗以鄭和當即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等定雲南所俘之幼童，年在十歲以內，應生於洪武十四年，而他在宣德五年最後一次出使後不久即老死，可推測卒於宣德十年（1435），壽六十五歲左右。束世徵不同意，認為洪武十五年馬哈只死，和已事燕王於藩邸，時年不得過十歲，應生於洪武六年（1373）以後，享年約六十歲。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1948）、朱偁《鄭和》（1956）及臺灣徐玉虎《鄭和評傳》（1958）皆從吳晗說（朱偁以鄭和卒於宣德九年）。鄭鶴

<sup>20</sup> 鄭和家世及出身的基本資料詳《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上冊，頁 1–28；《鄭和家世資料》，頁 1–7。有關鄭和的家世，及是否為咸陽王賽典赤·瞻思丁後裔的討論，詳李士厚：〈《鄭氏家譜首序》及《賽典赤家譜》新證〉，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5 年），頁 88–95，97–113；邱樹森：〈鄭和先世與鄭和〉，載同書，頁 1–7；又見周紹泉：〈鄭和與賽典赤·瞻思丁關係獻疑〉，《鄭和研究》第 7 期（1988 年 12 月），頁 6–13；劉琨：〈賽典赤·瞻思丁應是鄭和的先祖〉，《鄭和研究》1994 年第 4 期，頁 19–22；馬穎生：〈鄭和是賽典赤後裔說應該可信〉，《回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80–81 等。參《資料索引》，頁 61–66 等。關於李至剛撰〈馬哈只碑銘〉，詳鄭寬濤：〈李至剛與《馬公墓誌銘》〉，《鄭和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31–33。有關鄭和「三保（寶）」名號的問題，參范中義：〈「三保太監」名號的由來〉，《歷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頁 145–46；又參《資料索引》，頁 57–58；韓勝寶：《鄭和之路》，頁 217–18。

聲於 1980 年與子鄭一鈞編纂之《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上冊，對鄭和生卒年仍依舊說。但是二者於 1985 年發表〈鄭和下西洋史事新證〉，引鄭一鈞於 1983 年 3 月在《光明日報》報導的新資料，斷定和卒於宣德八年。此新資料為收錄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三山道士所刻萬曆羅懋登撰《新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二十卷末，在天順元年撰的〈非幻庵香火聖像記〉內記載鄭和奉「上命前往西洋，至癸丑歲，卒於古里國」一條。癸丑歲為宣德八年，自此鄭和的卒年得到確實的證據。<sup>21</sup>

按〈非幻庵香火聖像記〉為鄭和友好非幻禪師於 1457 年撰寫，上距鄭和之卒二十四年。非幻庵在南京碧海寺，內有沉香羅漢一座，據說是禪師下西洋時取來。根據〈香火聖像記〉，鄭和於永樂初已皈依釋氏，宣德改元，宗謙禪師住持牛首山弘覺寺，和時為南京守備太監，與之深契，在訪謁時曾「覽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於是「伐木鳩材，復崇棟宇，像設起人之瞻敬」。可見在宣德五年最後一次下西洋前，鄭和因感佛法的宏偉，便在此建造廟宇，以為晚年精神的寄託。（按：近年訪古者在兜率崖發現石刻及殘碑，證實有關廟宇的建造，其地距牛首山西麓的鄭和賜葬墓不遠。）又命工鑄金銅像十二，雕妝羅漢十八，並古銅爐瓶及鐘聲樂師，燈供具等安放於宅，繼復慮後來乏人崇祀，留言等候西洋回還俱送小碧峰寺之退居庵供奉，這是鄭和的遺囑。因此自和病逝古里後，宗謙禪師數度詣宅建齋薦度，並於宣德十年與鄭和家人及隨從商議，遵囑將上述物件送往碧峰寺退居庵供奉。正如前揭在下西洋中所建立的天妃紀念碑反映鄭和對道教神靈的崇信，這篇〈香火聖像記〉對鄭和晚年虔奉佛教及其遺言與卒年的確定都非常重要。<sup>22</sup>

<sup>21</sup> 見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1935 年 9 月），頁 161；鄭鶴聲：《鄭和遺事彙編》，頁 27-28（引吳晗及東世徵之意見；東氏說原載所著《鄭和南遊記》〔重慶：青年出版社，1941 年〕，頁 31，67；朱楔：《鄭和》，頁 127，130；徐玉虎：《鄭和評傳》，頁 145，184；《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上冊，頁 101，138；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史事新證〉，《中華文史論叢》1985 年第 3 輯，頁 63-70。英文鄭和傳的生卒年亦作 1371-1433，見 Kuei-sheng Chang, "Cheng Ho," in *DMB*, vol. 1, p. 194;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 pp. 58, 172。

<sup>22</sup> 關於〈非幻庵香火聖像記〉的考證，見鄭鶴聲、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史事新證》，頁 63-68。有關在牛首山南麓兜率崖發現的石刻及殘碑，見鄭一鈞：《鄭和全傳》，頁 404-15。鄭和基本上信奉伊斯蘭教，但又崇信佛道，晚年皈依釋教。例如，他在永樂十八年（1420）資助刊刻的《施引大藏經發願文》和後來刊刻的《優婆塞戒經》卷七後所附〈題記〉，都署名「大明國奉佛信官內官太監鄭和，法名速南吒釋，即福吉祥」。見鄧之誠（著）、鄧珂（點校）：《骨董瑣記全編》（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骨董瑣記三記〉卷六「鄭和印大藏經」，頁 564-65。學者對鄭和宗教信仰的討論甚多，參何平立：〈略論鄭和之宗教觀〉，《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 年第 2 期，頁 23-30；林松：〈論鄭和的伊斯蘭教信仰——兼評鄭氏的「崇佛」、「崇道」說〉，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二集，頁 115-37；韓品增：〈鄭和宗教活動述考〉，載同書，頁 139-46；及魏德新：〈鄭和宗教信仰初探〉，《鄭和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54-56。又參《資料索引》，頁 180-86；韓勝寶：《鄭和之路》，頁 224-26。

但是鄭和的生年續有爭議。1985年周紹泉對舊說提出修正，認為鄭和是在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底（1382年1月），被攻入雲南元江路的金朝興所俘之幼童，翌年朝興死，幼童歸藍玉，於十七年回朝領至南京見太祖後被閹割，一年後便被藍玉帶到北平送交燕王。由於吳晗等皆以鄭和入燕藩時為十歲左右，因此他的生年往前推便是洪武八年。謝方以鄭和在洪武十七年被送往南京宮中受閹，時年在九至十四歲間，因此推算應生於洪武八年，卒於宣德八年，壽五十九歲。1995年孫雲南撰文，否定鄭和為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等定雲南所俘之幼童，認為和係於是年底沐英等平曲靖，時年十八歲（據馬哈只的〈墓誌銘〉記其卒於洪武十五年，年三十歲，推測其二十二歲生鄭和，時為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因此推論此時和的年齡），以「抗拒王命」的戰俘身份送南京服宮刑被閹，因此按上推應生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卒於宣德十年以後，享年七十餘歲。對於上述兩種新說學者大都不認同。徐克明以〈重溫《故馬公墓誌銘》〉為題，認為孫氏強解馬哈只紀年，又誤讀《太祖實錄》及其他史料有關明軍攻入雲南的時間及地點的記載，因此錯誤推斷鄭和生於元至正二十五年。曾鐸波認為，周紹泉以鄭和為金朝興（1331-1382）於洪武十四年底攻入雲南所俘之幼，十七年被帶至南京後被閹割，係據道光雲南《江川縣志·古跡》所載當地兩名幼童所遭的同樣命運來推論，而定鄭和生於洪武八年，但並無直接史實支援。因此，有關鄭和的生年仍難斷定，要等到確鑿的資料發現始能解決。<sup>23</sup>

鄭和於宣德八年卒於古里雖然得到確定，但是他的葬地仍是一個謎題。鄭和墓的最早記載，見康熙二十二年（1683）所修的《江寧縣志·陵墓》：「三寶太監鄭和墓，在牛首山之西麓。永樂中命下西洋，有奇功。……宣德初，復命入西洋，卒於古里國，此則賜葬衣冠處也。蔭兄之子〔鄭〕義，世襲錦衣千戶，後遂祔焉。」此則明顯謂其埋葬為衣冠，而其養子義後祔葬。同治十三年（1874）所修的《上江兩縣志·山》「牛首山·太監鄭和墓」條又言：「永樂中命下西洋，宣德初復命，卒於古里，賜葬山麓。」後者為上元及江寧兩縣志，據此鄭和係葬於牛首山南麓，但未言是否係遺體。此墓於1959年被發現，地在該山的周昉村，當地人習稱為「馬回回墓」，墓西有一村落名鄭家村，為守墓者後裔所居。1985年地方當局照穆斯林葬儀的習慣、規格及風貌將墓修繕一新，題名「鄭和墓」，至此鄭和的墓地已經肯定。不過，議論仍然喋喋不休，究竟鄭和在牛首山周昉村的墓是實際的葬墓，還是他的衣冠塚？與前者的關係又為何？

<sup>23</sup> 周紹泉：〈鄭和的生年與卒年〉，《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頁40-47；謝方：〈鄭和生卒年及賜姓小考〉，《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1期，頁56-60；孫雲南：〈鄭和生卒之年商榷〉，《鄭和研究》1995年第4期，頁26-31；徐克明：〈重溫《故馬公墓誌銘》——與孫雲南先生討論關於鄭和生卒之年與家世〉，《鄭和研究》1997年第4期，頁31-32；曾鐸波：〈鄭和的家世與生年存疑〉，載南京鄭和研究會（編）：《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鄭和下西洋59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年），頁332-36。

鄭一鈞據鄭和後人及所傳《家譜》所說，認為《上江兩縣志》記載的為衣冠塚，但未談及《江寧縣志》所載的另一鄭和墓。有學者認為，鄭和死後應按穆斯林儀俗就地葬於古里，而傳說又稱他葬於蘇門答臘或爪哇；況且，從古里回南京的海程需時四月，夏日炎熱，屍體難免會腐化，因此就地而葬合乎情理。不過，上述各地均未發現鄭和墓葬遺跡，難以附和其說；又有學者認為鄭和死後就地火化，其骨灰運回中國土葬。近時南京鄭和研究會馬光汝及南京大學潘群則支持牛首山南麓的為鄭和葬墓，認為像鄭和這樣得到皇帝敬重、為聖朝立下頭等大功的人物，死後自要運回原住地南京歸葬始合乎體制和傳統。何況中國當時已盛行水銀防腐，先前明朝政要死後用水銀防腐經有其例。因此，他們肯定牛首山南麓的為鄭和的實墓，而西麓的為衣冠塚，不過此說仍未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sup>24</sup>

2003年，南京博物院葛曉康整理1956年在牛首山弘覺禪寺塔地宮發現的文物，並結合史家對鄭和研究的多項成果，撰文發表對其葬地的嶄新觀點。按牛首山弘覺寺創建於南朝梁代天監年間(502-519)，稱佛窟寺，南唐時改今名，宋又改名崇教寺，明洪武建弘覺寺塔，其後荒廢，至宣德八年始在山之東峰西麓重建弘覺寺塔。主持其事者為內官監內使阮昔，是年五月隨太監王謹往太倉封自西洋回還之寶船(其中可能載有是年初卒於古里的鄭和的遺骸或骨灰)，因此在此時建弘覺寺塔有特別意義。<sup>25</sup>地宮中出土十幾件古代文物，非常精美有特色，考古人員將其分為三組以便分析。第一組文物由青花蓮花紋瓷罐弦紋錫香盒、玉貫耳箸瓶及白銅小香叉組成三設(一般供室內燃檀香之用)。第二組由銅鑲金釋迦涅槃像、銅鑲金喇嘛塔、紅砂石金剛寶像座、一件青花蓮花紋瓷罐和三件青花雜寶紋瓷罐組成的一座小型金剛寶像塔。喇嘛塔下枋的正、背面分別鑿刻楷書銘文，前為「金陵牛首山弘覺禪寺永充供養」，後為「佛弟子御用監太監李福善奉施」，顯示奉施的主人及供養的對象。第三組文物由龍泉窯青釉舍利蓋罐和罐內所藏之物組成。罐內有老人牙齒一顆及骨灰，顯然與太監李福善有關。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的顏色是綠，表明這位太監可能是伊斯蘭教徒。

<sup>24</sup> 以上引文見莫祥芝、甘紹盤(修纂)：《江寧縣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卷五〈陵墓〉，頁二四下；莫祥芝、甘紹盤(修纂)：《上江兩縣志》，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卷三，頁三九上；《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頁10-13；《鄭和家世資料》，頁7。有關鄭和墓葬地及各種議論，參王引：〈鄭和家世及其墓葬考略〉，《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頁70-73；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頁338-39；韓勝寶：《鄭和之路》，頁194-95，245-47。又參下文注26。

<sup>25</sup> 有關文獻見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三三〈牛首山弘覺禪寺〉；明盛時泰：《牛首山志》上、下卷，載《南京文獻》第一號(南京：南京市通志館，1947年)。參下注。

作者認為，從地宮的建築規模風格、各種遺物的特徵及陳設的形色，並參照建寺塔的時間與文獻記載來看，地宮埋骨的應是一位曾下西洋、有伊斯蘭教背景但供奉佛門、顯赫一時的名太監。李福善究竟是誰，作者推論應是鄭和，因為他的釋氏法名是「福善」，與墓主吻合。不過最難解釋的是姓李的問題。作者以為鄭和冒姓，蓋因為他本身是伊斯蘭教徒，但晚年信佛，心境複雜，不希望子孫步他後塵，又不希望在姓氏上給後代留下遺憾，所以在法名福善前冠以李姓。至於為何選姓李，作者解釋是因為前代南唐的先主李昇（937–943 在位）及中主李璟（943–961 在位）的陵寢就在牛首山地區，而根據洪武二十六年所定的祭祀制度，凡修建廟宇，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及名山嶽鎮，應合祭祀，所以冒以李姓，在為第七次下西洋開御祭一壇時又合祭南唐的君主。<sup>26</sup> 不過，這篇考證雖然發掘不少新資料，解決很多疑點，但對鄭和何以選用李姓則出於推論，未有強力的證據支持。所以李福善是否鄭和，地宮的人齒骨灰是否屬於鄭和，仍不能下定論。

2005 年鄭和的後裔鄭寬濤及鄭自海分別撰文，對牛首山弘覺禪寺塔地宮遺下的喇嘛塔銘文所書的太監李福善的身份作重新考證，認為應是英宗（1435–1449，1457–1464 在位）的御用監太監李童，前人推論李福善為鄭和的冒姓名不能成立。二氏探討這個課題基於在研究北京西山的廟宇時，在紫微山麓發現一座由李童於正統年間主持興建的法源寺，內裏有珍貴的寺碑及金碧輝煌的壁畫，而大部份的壁畫都顯示藏傳佛教藝術及密宗故事人物。根據寺旁〈御用監太監樸庵李君碑〉的記載，李童為江西廬陵人，字彥貞，號樸庵，法號福善。生於洪武二十二年（1389），卒於景泰四年（1452），享年六十三歲。他於永樂初入選內廷，可能與鄭和等共事，多次扈從成祖北征蒙古餘眾，仁宗時（1425）隨駕平定漢王高煦叛亂，宣宗時又隨帝征討蒙古兀良哈部，立下功績。英宗登基時，李童已是三朝元老，得英宗賞識，隨又拜於太監王振門下，權傾一時。因此能利用特權，廣泛募集錢財，於四年半內（正統四年〔1439〕二月至八年〔1443〕十月）建成這座宏威壯麗的法源寺作為自身的家廟。

作為鄭和的後輩，李童的宦歷與和及其他下西洋的太監相似，都曾侍從皇帝征戰有軍功；而從法源寺諸碑及壁畫所展示，顯然對鄭和及下西洋事業甚為崇敬。今以北京法源寺藏存由李童收集繪制的藝術文物與南京弘覺禪寺塔地宮遺留的精美鑄造法器比較，二者的關係便昭然若揭。簡言之，安南籍內使阮昔在宣德八年七月，於南京牛首山興建為紀念鄭和航海事業的弘覺禪寺塔時，無疑得到李童的大力支持；正統年初落成後，李童建議英宗勅賜今名，而在四年初又回北京興建法源寺。

<sup>26</sup> 詳葛曉康二文：〈南京牛首山鄭和歸葬處之考證——兼考「三寶」和「三保」太監〉，《鄭和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36–48；〈南京牛首山鄭和歸葬處之考證拾遺〉，《鄭和研究》2003 年第 2 期，頁 50–51。

由於李童對鄭和尊敬愛戴，又同是密宗的信徒，當其與志趣相同的宦官促成修建弘覺寺後，將自己姓名刻於由他奉施的鑿金喇嘛塔下，永遠陪著鄭和的骨灰，此舉措甚合乎情理，與閩宦對身後事安排的傳統又相吻合，這就可了解寺塔地宮各種文物法器安排的特殊意義。<sup>27</sup> 由此看來，牛首山西麓弘覺寺塔的地宮就是鄭和的骨灰被賜葬之地，主持葬禮儀式的可能就是李童。若此說成立，牛首山南麓周昉村的便不是鄭和的實墓，而是衣冠塚，然則在西麓的是否另一衣冠塚，仍待進一步研究。

至於永樂帝詔諭下西洋時任命鄭和為統帥，一說得於近臣姚廣孝和袁忠徹（1376–1458）的極力推薦。姚廣孝於永樂元年曾為鄭和刊刻的《佛說摩利支天經》題記載：「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部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盡而矣。」<sup>28</sup> 袁忠徹為著名風鑑相士，他的《古今識鑑》對鄭和有此描述：「內侍鄭和即三保也，雲南人。身高九尺，腰大十圍，……四嶽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極貴。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接言：「後以靖難功授內官太監。永樂欲通東南夷，上問：『以三保領兵如何？』忠徹對曰：『三保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臣察其氣色，誠可任。』遂令統督以往，所至畏服焉。」<sup>29</sup> 太宗任命鄭和為統帥，論者認為因和以軍功及才能識見得寵，又得近臣支持，而其人又是雲南回回顯族的後裔，信仰伊斯蘭又崇拜佛教，對信奉二教的海外番國有強烈號召之故。然而下西洋之事，究竟係出於皇帝主旨，抑或是鄭和及其對通番取寶有意欲的閩宦慫恿則無由知悉，不過這些盤據燕邸的從龍之士，顯然對歷次出洋的推動及管制產生極大作用。

<sup>27</sup> 詳鄭寬濤二文：〈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之謎〉，《鄭和研究》2005年第2期，頁35–43；〈探索南京牛首山弘覺寺塔地宮之謎〉，載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5年），頁857–64；及鄭自強：〈明御用監太監李童為鄭和研究留下諸多課題〉，《鄭和研究》2005年第4期，頁26–30。

<sup>28</sup> 姚廣孝為鄭和刊刻的《佛說摩利支天經》題記，見《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上冊，頁34。姚廣孝傳見《明史》，卷一四五，頁4079–84；及Eugen Feifel/Hok-lam Chan, “Yao Kuang-hsiao,” *DMB*, vol. 2, pp. 1561–65。按明代史籍地誌皆無提到姚廣孝曾下西洋，但近年在福建長樂市姚坑村發現民國二十九年（1940）傳抄的《姚氏族譜》，則記載姚氏於「永樂九年〔1411〕合同中貴〔按即鄭和〕駕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抵林邑〔占城〕，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今馬六甲〕，由是而達西洋古里大國。」詳池敬嘉：〈姚廣孝隨鄭和下西洋蠡測〉，載《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766–72。按此行為鄭和第三次下西洋，姚廣孝有無參加，《族譜》資料後出，若無旁證，不宜輕信。事實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

<sup>29</sup> 袁忠徹對鄭和的評論見《古今識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卷八，頁一〇上至一〇下。

不過根據資料，縱然先祖有航海經歷，鄭和早年對航海的經驗實在微不足道，因為他生長於雲南內陸，其地雖有滇池，儼如大海，童年時或在湖畔戲水甚至趁舟遊弋，但在十歲左右即被明軍俘虜至南京，數年後入燕藩為闈宦，自此被編入軍旅，扈從未來皇帝征戰，在防守北邊及「靖難」之役立功，擅於統軍陷陣，但並無航海出洋的記錄。因此，就算他在被賜姓鄭，晉升太監後曾獻議下西洋通番，亦不意味已掌握航運知識。時人曾據後出記載，揚言鄭和曾於永樂元年及二年奉使暹羅及日本，作為其已具備出洋經驗的證據。例如林松據清初《天妃顯聖錄》及《敕封天后志》，稱鄭和於永樂元年奉使暹羅，至廣州海洋遭風將沒，幸得神妃顯靈救援，但徐玉虎謂其說不可置信，因為資料晚出，況且和至永樂二年始獲賜姓鄭（按姚廣孝於永樂元年所撰《佛說摩利支天經》已書鄭和之姓名），前此官史並無記載以馬和或鄭和之名的使者奉使其國。<sup>30</sup> 又潘群據明末史志如鄭舜功所撰《日本一鑑》，及鄭若曾編《籌海圖編》等記載，言永樂二年四月，朝廷以倭寇犯直隸、浙江地方，因遣鄭和統率水軍招諭日本，其王源道義（幕府將軍足利義滿）隨遣使獻所俘倭寇。不過，旅日學者陳福波指出官史無載其事，而且上年底朝廷已遣趙居仁等出使日本，二年三月返國，因此無必要再派鄭和出使。<sup>31</sup>

在此二年間，鄭和究竟曾作何事，文獻不足，難以斷定，不過按理應致力於熟習航路及指揮樓船水師，為下西洋作準備。清人的水程記載稱在此期間，他曾與三數宦官同僚下海作小規模的探索，搜集針路、海島、山嶼及水勢等資料。年前在泉州發現的《海底簿》載：「永樂元年，奉旨差官鄭和、李興、楊敏等，出使異域，前往東西洋等處。一開諭後，下文索圖，星槎、山峽、海嶼、水勢，圖為一書。務要選取山形水勢，日夜不致誤也。」<sup>32</sup> 此條又見較早出的《順風相送》序言，雖未署鄭和及其同僚名字，但足以說明放洋前的準備工作。綜合來看，鄭和係以統軍指揮作戰見長，缺乏具體的航海遊弋經驗，從未率領艦隊出洋，因此需

<sup>30</sup> 見林松：〈試論鄭和出使暹羅及明皇朝與暹羅國的友好往來〉，《鄭和研究》1993年第4期，頁1-6；非議見徐玉虎：〈鄭和元年奉使暹羅國之商榷〉，《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臺北）第二十七期（1995年9月），頁175-82。

<sup>31</sup> 見潘群：〈鄭和使日問題初探〉，《文史哲》1982年第3期，頁13-18；潘群、申海田：〈鄭和使日問題再探〉，《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頁76-81；陳福波：〈鄭和下西洋前使日的探討〉，《鄭和研究》1997年第4期，頁4-11。但時人仍有附和舊說，見鄭永常：〈鄭和東航日本初探〉，載《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1-90；對此文之評論見同書頁361-66。

<sup>32</sup> 《海底簿》原文見《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頁252-53引。簡介見莊為璣：《古刺桐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327。《順風相送》序言見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22。解題見頁1-12。

要其他富於海運知識的同僚支援，特別是閩省沿海熟悉航行的「火長」。《太宗實錄》永樂五年九月、九年八月、十五年(1417)六月、十七年(1419)七月下記載賞賜下西洋的有功隨員，便屢屢提到「火長」，而且有「番火長」，顯示掌舵的航海員中還有外國人，很可能是留居福建富有遠洋經驗的阿拉伯裔領航員。領導這些「火長」，便是同具太監官階具有航海經驗的王景弘(王貴通)，成為與鄭和下西洋出使的雙領導。<sup>33</sup>

## 五

關於王景弘的事跡，首要交代的是他原名貴通，而景弘是後來的改名的問題。從明代史書記事的年代考察，如上揭《明史·宦官傳·鄭和》所示，王景弘(一作景宏)早於永樂三年便參加首次下西洋的壯舉，但若以史料本身的年代作論斷，王貴通出現於記載卻比王景弘為早。根據現存資料，他這個名字始見於鄭和領銜、敘述奉皇帝命在錫蘭島佈施供奉佛寺、通稱〈佈施錫蘭山佛寺碑〉的碑文內。此碑刻有漢文、淡米爾(Tamil)及波斯三種文字，原碑今藏斯里蘭卡科倫坡(Colombo)之首都博物館。碑文所紀之永樂七年二月甲戌朔日，應是下諭封神之日，與在錫蘭島建碑無關，因此時第二次之航行仍未回歸，大概到八年之下半年，第三次下西洋到達其地時始立碑。<sup>34</sup>此外，王貴通之名分別見於宣德五年修成的《太宗》及《仁宗實錄》。《太宗實錄》永樂五年九月庚辰載「遣王貴通賚敕往勞占城國王占巴的賴〔Champadhirā jā, 一稱 Jaya-Simhavarman V〕，賜王白金三百兩，縵絹二十表裏，嘉其嘗出兵助征安南也。」《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1424)八月丁未條又記：「命太監王貴通率下番官軍赴南京鎮守，宮中諸事同內官朱卜花、唐觀保，外事同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此後，明代載籍(包括《太宗實錄》)記載永樂朝下西洋的事跡，只有南明佚名編的《天妃顯聖錄》沿用王貴通之名。例如記永樂十五年，「欽差內官王貴

<sup>33</sup> 這些「火長」見《太宗實錄》，卷七一，頁999；卷一一八，頁1500-1501；卷一九〇，頁2013；卷二一四，頁2149。詳王傑：〈簡論鄭和船隊的「火長」〉，載《走向海洋的中國人》，頁190-99。

<sup>34</sup> 〈佈施錫蘭山佛寺碑〉的發現最先報導見Perera, "The Galle Trilingual Stone," *Spolizaa Zeilanica* 8.30 (1913), pp. 122-27。英譯見"A Chinese Inscription from Ceylo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5 (1914), pp. 171-72。又參山本達郎：〈鄭和の西征〉，《東洋學報》第二十一卷第三至四期(1935年)(譯文見王古魯：〈鄭和西征考〉，《文哲季刊》[武漢大學]第四卷第二期[1935年]，頁398-99)；及《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頁943-45。此碑文的詳細校訂見吳之洪：〈《佈施錫蘭山佛寺碑》碑文及相關史實考〉，《鄭和研究》2005年第4期，頁41-45。

通……並道士詣廟修設開洋清醮」。又記永樂十九年「太監王貴通等又奉命往西洋，禱祝顯應」。顯然沿襲已佚的舊資料，其他記載都改用王景弘一名。<sup>35</sup>

王景弘之名始見於官私載籍，以史料本身的年代推定，最早為《仁宗實錄》洪熙元年(1425)二月戊申條。此處記鄭和率下番官軍鎮防南京云：「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於內則與內官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商議的當然後施行。」按《仁宗實錄》雖於宣德五年修成，但資料本諸洪熙時檔牘，足證王景弘之名於仁宗登基後已開用於官書。嗣後，《仁宗實錄》與《宣宗實錄》所載下西洋事情，皆通用王景弘之名，例如現存的宣德五年所頒恢復航海通番的敕書便載其名：「勅：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羅智、唐觀保，大使袁誠。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謀〔謨〕斯〔Hormuz〕等國公幹，大小舡六十一隻，該關領原交南京入庫各衙門一應正錢糧並賞賜番王頭目人等綵幣等物，……勅至，爾等即照數放支與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關領前去應用，不許稽緣。故勅。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sup>36</sup>

然則，王貴通是否即是王景弘？根據上列資料排比，兩人活躍於同一時期，都是內宮閹寺，後來晉升太監，隨鄭和出使西洋，為統率舟師列名次席的正使，許多行事都離奇地吻合。其次，從史事記錄的年代而言，兩者的行事都是相續的，並無重複或衝突。當王貴通在記載上消失後，王景弘的類似事情便接著出現，二人未有在同時代的記載中並列。最顯著的例證，是前揭《仁宗實錄》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丁未條，與洪熙元年二月戊申條，二者同記一事，但前者用王貴通名，後者則以王景弘替代。2004年出席漳平市王景弘研討會的學者多數贊成此說，但亦有質疑。李金明指出《太宗實錄》載永樂五年九月「遣王貴通賚敕往勞占城國王占巴的賴，……嘉其嘗出兵助征安南也」。永樂五年是鄭和第二次奉使西洋，當時王景弘與之隨行，如果王

<sup>35</sup> 見《太宗實錄》，卷八八，頁1162；卷七一，頁999；卷八八，頁1162；張輔等（監修）：《仁宗實錄》（1962年），卷一上，頁6。《天妃顯聖錄》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八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所，1960年），引文見頁9，38。此書有德文翻譯：Gerd Wadow, *T'ien-fei hsien-sheng lu: Die Aufzeichnungen von der manifestierten Heiligkeit der Himmelsprinzessi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29. (St. Augustin/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2)。王貴通奉命往西洋事見 pp. 144, 228，但未說明其與王景弘的關係。最近傅郎撰文，報導2004年福建東山縣發現記載鄭和等在永樂十五年第五次出洋的〈舟師往西洋記碑〉，內有「正使太監王景弘」一名，為一新發現，但未悉此文係原刻或後來補刻，仍待進一步研究。傅文題〈東山鄭和《舟師往西洋記碑》碑文研究〉，載《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頁956-65。

<sup>36</sup> 見《仁宗實錄》，卷七上，頁232。宣德五年敕書收入《西洋番國志》，〈勅書〉（三），頁16。

貴通就是王景弘的話，何以一人能同時出使二處？<sup>37</sup>不過事實上，《實錄》載永樂五年九月壬子（初二）鄭和等首次出洋回歸，同月庚辰（三十）命王貴通賈敕往勞占城國王，而據〈福建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是年冬或六年春（確實月日不詳），鄭和等始第二次下西洋。故此，王貴通若不是先往占城然後回國參加遠航，則在其地等候鄭和舟師繼續航程，或是稍遲始與船隊出發，到占城時賈敕往勞國王。從史料記載的時間考察，並不出現一人能同時出使二處的問題。

王貴通何故更名為王景弘？下揭康熙三十一年（1692）《寧洋縣志·中官》的王景弘小傳，說他於「永樂間隨太宗巡狩，有擁立皇儲功」。前者指景弘在洪武後期，數從燕王出征侵犯北邊的蒙古族人，後來又參加「靖難」之役建功勳。後者意指永樂二年，他支持冊立世子朱高熾（1378–1425）為皇太子，並於永樂帝死後，在其二、三弟太子高煦（1380?–1429?）與高燧（卒於 1431 年）陰謀篡位時護駕世子登位為仁宗。<sup>38</sup>仁宗登基未幾王景弘之名即出現，很可能是皇帝感謝擁立之功，因此賜他「景弘」一名。（時人陳培基及徐克明撰文謂「仁宗登基後改年號為『洪熙』，從『景弘』與『洪熙』字音與字義間的關係來看，可以無疑地肯定『景弘』這個名字是仁宗所賜。」）從文義上來考慮，「貴通」與「景弘」兩個名字密切相關，若前者為名，後者為字，十分貼切典雅，很容易聯想同為一人。這樣看來，二者為一人的前後名實無懈可擊。不然，何以解釋像王貴通這樣重要的通番大使，在永樂朝以後寂寂無聞；而王景弘如此顯赫的鄭和同儕，竟然不見於永樂的記載，等到洪熙年下西洋的高潮結束後始冒頭？可惜的是，清修《明史》不獨不為這位先賢立傳，而且在敘述明初下西洋通番事情，凡是有關王貴通的，都錯用王景弘一名替代，造成嚴重的歷史年代混亂。因此，要綜合二者的資料始能作一全面的傳記研究。<sup>39</sup>

王景弘究竟為何處人士？（羅懋登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稱他為「山東青州府人士」，係小說家言，不可置信；見下。）漳平市博物館首任館長羅宜生（羅岩），曾就此問題作實地調查，認為景弘可能是五代創建閩國的王審知（862–925）的後裔。所根據的是福建省永安清水的《太原王氏族譜》，及漳平易坑的《王氏族譜》關於王氏

<sup>37</sup> 見李金明：〈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載《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頁 26–28。贊成筆者說法的有鄭一鈞：〈論王景弘的歷史功績〉，載同書，頁 73–74；李貴海：〈王景弘評說〉，載同書，頁 138–39；黃瀚：〈破解王景弘之謎〉，載同書，頁 148；及梁麗娜：〈王景弘：從下西洋到二十一世紀地方形像重塑〉，載同書，頁 176–77。

<sup>38</sup> 永樂帝冊立朱高熾為世子事見《太宗實錄》，卷三〇，頁 539。朱高煦與高煦傳記見《明史》卷一一八，頁 3616–20，3620–21。高煦與高熾爭奪儲位事略見趙令揚：〈朱高熾、高煦兄弟爭位淺議〉，《明清史集刊》（香港大學中文系），第一卷（1985 年），頁 1–14。

<sup>39</sup> 參陳學霖：〈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頁 193–96；又參陳培基、徐克明：〈鄭和與王景弘勝似雙子星座〉，載《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頁 43。

上代的一些記載，報道在閩國亡後，王審知後人的一支在明洪武年間從永安遷居漳平，但沒有說明其與王貴通（王景弘）家族的關係，亦未提到後者的三代。這是一個很籠統的說法，純粹攀援附會，並沒有解決問題。<sup>40</sup> 關於王景弘的實際籍貫，莊為璣最早據清人蔡永兼（1776–1835）《西山雜誌·三寶下西洋》的記載，「永樂三年，成祖疑惠帝南逃，命中官鄭和、王景弘、張文等造大舶百艘，率軍二萬七千餘。王景弘，閩南人，僱泉州船以東石沿海名舩導引，從蘇州劉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稱他為閩南人。筆者前作亦從其說但又據徐曉望的論著，引乾隆三年（1738）修纂《龍巖州志·人物上·中官附》的王景弘小傳，「王景弘，龍巖集賢里人，後分屬寧洋。永樂間隨太宗巡狩，有擁立皇儲功，恩賜嗣子王禎，世襲南京錦衣衛正千戶」，稱他為福建龍巖縣集賢里（今漳平市）人。<sup>41</sup>

2003年曹木旺作更深入考證。他首引康熙三十一年修纂《寧洋縣志·中官》下載小傳：「王景弘，集寧里人。明永樂間隨太宗巡狩，有擁立皇儲功，恩賜嗣子王禎，世襲南京錦衣衛正千戶。」《寧洋縣志》此傳較乾隆《龍巖州志》者為早，所載事跡為後者因襲，雖然二者都未提到他曾出使西洋，但應是方志最先記載王景弘的傳記。按寧洋縣始建於隆慶元年（1567），集寧里為該縣轄地，1956年撤銷建置。寧洋縣在建縣前隸屬龍巖縣，縣後升為州，因此《龍巖州志》亦有王景弘小傳。按寧洋縣在撤銷建置後分別劃歸龍巖、永安、漳平三縣，其中集寧里被撥入漳平縣（1990年建市），而寧洋縣明之前隸屬於漳州管轄，當地通用閩南話，風俗習慣與閩南相同，故蔡永兼可稱王景弘為閩南人。由於寧洋縣舊屬漳州，因此康熙五十四年（1715）修纂《漳州府志·武勳》亦附載王景弘傳記，記云：「王景弘，集寧里香寮人，從太宗北征，後有擁立功，授其子南京錦衣衛正千戶。」曹木旺據此線索多次到漳平市的香寮村作實地調查，在許家山自然村發現眾多「王」姓墓碑，因此認為王景弘是「漳平市赤水鎮香寮村許家山自然村人」，理據明確，目前可以作為定論。

此外，還須注意，上述地方志記載並無透露他是閩宦，始名王貴通，曾與鄭和數下西洋，又未解釋他「有擁立皇儲功」的意義。曹氏引《寧洋縣志》王景弘傳後的評論說：「閩豎多產於北方，閩人從不入選。有之，亦間世一出也，書以誌異。」認為時人痛恨宦官禍國殃民，不以家族所出太監為榮，反以為恥，或因此故對王景弘的事

<sup>40</sup> 見陳培基，徐克明：〈鄭和與王景弘勝似雙子星座〉，頁42；羅岩：〈明代航海家王景弘史事初考〉，載《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頁324–25。

<sup>41</sup> 蔡永兼《西山雜誌》約於嘉慶十五年（1810）至十八年（1813）撰成，有手鈔本藏於福建晉江市圖書館，筆者未見，資料見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頁59；及莊為璣：〈試論鄭和與王景弘之死〉，《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頁89所引（原文頁87–95）。又參徐曉望：〈八次下西洋的王景弘〉，《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頁23–26，引張廷球修、徐銑等：《龍巖州志》，乾隆三年刊本，卷一〇，頁五五下；及陳學霖：〈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頁196–97。

跡也諱莫如深，別具一說。綜合來看，清人記載王景弘出使西洋的事跡，以蔡永兼的《西山雜誌》為最早亦最重要，因為說他「僱泉州船以東石沿海名舩導引，從蘇州劉家港入海至泉州寄泊」，透露他出身舟子，熟悉沿海航路，大概是掌管羅盤、按針路簿指引行船、時稱「火長」的一類導航人員。由於他是閩南人，與大多來自福建的舟子語言相通，容易領導，促使他成為鄭和下西洋航海的輔助統帥。<sup>42</sup>

王景弘未悉如何以王貴通之名成為宮人，入侍燕藩，因與鄭和同時受知於未來的永樂帝。論者揣測他幼年被闖或自宮，為地方官員或宦官與其他闖童進貢皇上，輾轉進入內廷服侍。不過無論出身如何，他之奉詔與鄭和同下西洋，無疑因為他有軍功及航海的知識與經驗。永樂朝六次下西洋的官方記載，雖然只有四次出現王貴通或王景弘其名，其餘皆書「鄭和等」，但他很可能每次都有參加，作為航海的總指揮、鄭和出使的主要夥伴（永樂五年並單獨出使占城），歷次回國，他都與鄭和同以南京守備太監身份，負責監管軍衛、修葺皇城宮殿、採購物料及運輸營建等重要任務。隨後他以「擁立皇儲功」見知於仁宗朱高熾，獲賜名景弘，復任南京守備太監。他亦見重於嗣位的宣宗，始初幾年繼續與鄭和合夥監造南京的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重修南京的大報恩寺，此外二人又提調修齋，著內府各衙門庫關支物料造辦，打發供應物件及賞賜僧人。

宣德五年六月，宣宗下詔恢復下西洋時，王景弘又再受命偕鄭和出征。行前宣宗賜詩二位以壯行色，其贈景弘詩有句稱許其忠誠：「昔時將命爾最忠，大船摩曳馮夷宮。驅使飛廉決鴻濛，遍歷島嶼凌巨洪。」此行鄭和於八年三月回程途中至古里病逝，王景弘便全權統領舟師回國，事後回任南京守備太監，參與策畫操練沿江戰船。<sup>43</sup>但《明史·蘇門答刺傳》記宣德九年，其國王宰奴里阿必丁遣「王弟哈利之漢來朝，卒於京。……時〔王〕景弘再使其國，王遣弟哈尼者罕隨入朝貢」，因此有稱景弘第八次下西洋。不過《宣德實錄》繫其事於九年二月辛亥，未言王景弘再使其國。《實錄》十年四月癸卯，記上諭命蘇門答刺國王男阿蔔賽亦的嗣為國王，始提到「先是，以公務遣中官王景弘往其國，遣其弟哈尼者罕等來京朝貢」。《明史》將二事混為一起，遂稱王景弘於九年又出使蘇門答刺。事實上，景弘於八年七月從西洋回京，而《實錄》十年正月甲戌又記其奉敕停罷採辦應用物料，行旅匆匆，令人懷疑會否於此短時期又往返蘇門答刺。他的卒年不詳，但是《英宗實錄》正統二年（1437）十月仍有

<sup>42</sup> 詳曹木旺：〈王景弘籍貫考略〉，載《「睦鄰友好」鄭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會（編）：《「睦鄰友好」鄭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2003年），頁388-93。曹文所引為康熙三十一年修《寧洋縣志》及康熙五十四年修《漳州府志》，筆者並未見原書；明萬曆的《漳州府志》及有關明代方志並無王景弘的資料。

<sup>43</sup> 以上參陳學霖：〈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頁204-14。宣宗〈賜王景弘詩〉收入《宣廟御制總集》，筆者未見原書，今從《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頁857轉引。

他負責選拔在京精銳軍伍、防範蒙古兵侵犯的記載，因此應該是在此年之後始歸隱或去世，享壽在六十餘至七十歲之間。<sup>44</sup>

不過，清中葉以來，一些外遊的文士開始報道南洋華人流傳鄭和及王景弘死於爪哇北部三寶壠 (Semarang) 的傳說。三寶壠為爪哇濱海的重要港口，山坡上有岩洞，華人稱之為「三保洞」，最初用以紀念鄭和，後來亦包括王景弘 (俗稱王三保)，據說其墓就在「三保洞」之旁。乾隆末年福建龍溪王大海撰《海島逸志·物考略一》，其「王三保」條記：「明宣德好寶玩，因命王三保、鄭和等至西洋採買寶物，止於萬丹〔Bantam〕，實未嘗至吧國〔Batavia〕，而三寶壠有三保〔寶〕洞，俗云三保遺跡。每朔望士女雲集，拜禱其處。」洞外有碑，於 1879 年豎立，碑文出當地僑領黃志信，首言：「時望安〔即 Semarang 的閩語音譯〕為王公三保大人歸真之地」，「歸真」，即指其葬地。今日三保洞外面已建為廟宇，其建築融合穆斯林及中國傳統風格及形式，成為當地各民族社群的共同拜禱及紀念集會的場所，十分興盛。事實上，正統初王景弘已達耄耋之年，體力不可再遠涉重洋，何況其時已施行海禁令，絕無死於三寶壠葬於三保洞旁之可能。這些綿綿不絕的傳說反映華裔對前代英雄的崇拜和對先賢的懷念，自有其歷史及時代意義，但不能以此作為考訂歷史的根本，故此以王景弘葬身異國是荒誕之說。根據近年學者的意見，如果他死於京師，可能歸葬於北京西郊的宦官墓地，但亦可能因為他與鄭和同下西洋，而其嗣子王禎又為世襲南京錦衣衛正千戶的關係，死後遷葬於南京。這些都是揣測，要等待墓碑資料的發現始能獲得答案。<sup>45</sup>

總而論之，王景弘的才能及恩寵與鄭和不相伯仲，既有軍功，又熟悉航海和營造工程，據說還擅長醫術。他與鄭和併肩統率艦隊出使相得益彰，對整個下西洋事業有重大貢獻。可惜因為種種原因，鄭和的名氣日益隆盛，掩蓋其他，致使王景弘長期

<sup>44</sup> 以上見《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傳六·蘇門答刺〉，頁 8421；《宣宗實錄》，卷一一五，頁 2597；孫繼宗（監修）：《英宗實錄》（1963 年），卷一，頁 34；卷六，頁 122；卷一四，頁 267；卷一五，頁 276，289；卷三五，頁 691。又參徐曉望：〈八次下西洋的王景弘〉，頁 23-26；黃瀚：〈破解王景弘之謎〉，頁 147-64。

<sup>45</sup> 以上參陳學霖：〈王景弘下西洋之史事與傳說〉，頁 218-24。王大海《海島逸志》有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序，今有姚楠、王琅璿校注、香港學津書局 1992 年排印本；「王三保」條見卷二，頁 39。黃志信所豎立碑首見 I. W. Young, "Sam Po Tong 三寶洞, La Grotte de Sam Po," *T'oung Pao* 9 (1898), pp. 93-102。有關三寶壠三保廟的歷史及王三保傳說的討論，見孔遠志：〈印尼三寶壠的三保廟與華人〉，《鄭和研究》第十二期（1991 年 5 月），頁 16-22；陳佳榮：〈鄭和、王景弘與三寶壠——重讀《海島逸志》有感〉，《鄭和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41-46；魏德新：〈王景弘宗教信仰初探〉，《鄭和研究》1994 年第 2 期，頁 54-56；及李金明：〈王景弘及其在印尼三寶壠的傳說〉，載《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頁 37-47 等。關於王景弘的可能葬地，參鄭自海：〈淺談宦官佛教信仰與王景弘葬地新觀點〉，載《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頁 267-69。

失去應得的歷史地位。近年來福建省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中心及漳平市王景弘研究會兩度聯合召開研討會，眾多論文抉幽發微，光大王景弘的生平事業，這種偏見忽略始有改觀。其中一篇論文標題〈鄭和與王景弘勝似雙子星座〉便反映這種均衡的理念，而另一篇對鄭和與王景弘的貢獻則有以下精警的比較。他說：「史料表明，鄭和與王景弘同為使團的正使。鄭和是船隊總攬一切公務的統帥，王景弘則主要負責航海的針路和管理船隊，是航海方面的首領。王景弘在航海前負責船舶的徵集、航海技術人員的甄選，航海路線的選擇確認等準備工作。在航海中，王景弘主要負責船隊的航海事務，與鄭和共同肩負指導船隊前往各國訪問的重任。」這是嚴謹而客觀的歷史評價。<sup>46</sup>

## 六

自宣德八年下西洋船隊回歸，宣宗即以完成任務，回應朝議節省國力對付蒙古威脅，改變對外政策，實施海禁，英宗嗣位開元正統（1436）亦隨從前朝定制。十四年（1449）蒙古族領袖也先揮軍壓境，英宗親征，於土木堡兵敗被擄，弟郕王登位為景帝（1450–1456 在位），英宗北狩竟年始釋歸，被幽禁於南宮逾七年始復辟，改元天順（1457–1464）。在此政權動蕩、內憂外患、國勢日敝期間，宦官雖仍然左右政局，但形勢已經改變，無條件再下西洋；而自鄭和、王景弘相繼謝世，宮內亦無領導出洋通番的人才，因此一時岑寂。至憲宗（1464–1487 在位）登位後，國勢稍好轉，記載稱有中官為迎合上意，向皇帝重提永樂、宣德故事，但並無結果。故而宣德以後，雖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及《西洋番國志》三書的面世，但文人著述除三數雜著，對下西洋事缺乏報導，亦鮮有正面評價，因此正德十五年（1520）成書的黃省曾（1490–1540）《西洋朝貢典錄》三卷，在其〈自序〉便有海外諸番「入我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記述，恐其事湮墜，後來無聞焉」之嘆。<sup>47</sup>

不過，鄭和下西洋這一由宦官集團主導的盛事，很快就成為宮廷戲劇和坊間評話的題材。早在神宗（1572–1620 在位）萬曆末年，宦者劉若愚（1584–1642?）在所

<sup>46</sup> 參福建省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被遺忘的「鄭和」——王景弘〉，載《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頁 8；陳培基、徐克明：〈鄭和與王景弘勝似雙子星座〉，頁 41。其他有關王景弘的評價見黃文光：〈試論王景弘與鄭和比較研究〉，載《王景弘與鄭和下西洋》，頁 46–50；李玉昆：〈偉大的航海家王景弘〉，載同書，頁 100–106；傅柒生：〈王景弘——與鄭和齊名的偉大航海家〉，載同書，頁 113–21；陳琦：〈王景弘簡論〉，載同書，頁 122–46。

<sup>47</sup> 馬歡《瀛涯勝覽》有永樂十四年（1416）〈自序〉，但成書於景泰二年（1451）；費信《星槎勝覽》成書於正統元年；鞏珍《西洋番國志》成書於宣德九年。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以記述鄭和下西洋史事為宗旨，主要為編集之作，較少創聞。其書收入清代四種不同叢書，今有 1982 年中華書局謝方的校注本，〈自序〉引文見頁 8。各書的簡介見《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頁 326–32。

撰的《酌中志》提到內宮演木偶戲的題本，便有〈三寶太監下西洋〉一目。明亡後錢曾（1629–1701）於《讀書敏求記》又說：「蓋三保下西洋，委巷流傳甚廣，內府之戲劇，看場之評話，子虛亡是，皆俗語之流為丹青矣。」究竟內府的戲劇如何搬演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特別是對宦官的演繹，是值得注意的問題。<sup>48</sup> 內府演鄭和事跡的戲劇可能很早已開始，而且有劇本流傳，可惜現存的只有趙琦美（1563–1624）脈望館抄校內府本《古今雜劇》收錄佚名撰〈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雜劇一種。這部雜劇末端書萬曆四十三年（1615）乙卯八月初二日，校內清常道人記。從年代來看，此劇比較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羅懋登完成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簡稱《西洋記》）晚出，寫作時很可能受到後者的影響，不過後者的出現，又明確受到內府演劇的啟迪。<sup>49</sup> 這雜劇演出永樂時三保太監奉命下西洋，多得寶物，並帶領西洋國王遠來朝貢的故事，內文加插不少虛構情節及怪異荒誕曲詞。劇本編造朝中大臣如吏部尚書蹇義（1363–1435）、戶部夏元吉尚書支援下西洋，定國公徐景昌（開國名將徐達〔1332–1385〕季子增壽之子）舉保鄭和為統帥。鄭和委任王景弘等太監，又請熟悉海運的名將平江伯陳瑄（1363–1435）同行。<sup>50</sup> 隨而顯著鋪張鄭和及王景弘的遠航功績，突出歷次往各國通番及取寶的輝煌成果，宣揚遠近番王親自及遣使來朝進貢的盛事。這些內容與官史政書的低調評述構成強烈的對比。

但是，對下西洋事有高度評價及提高鄭和、王景弘等遠航宦官統帥的地位還是羅懋登撰的《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一百回通俗小說。這部演義撰於萬曆二十五年，距日本豐臣秀吉（1536–1598）進攻朝鮮，妄圖直入中國只有五年，是時形勢日急，但是朝廷顛預無能。他的〈自序〉說明創作意圖：「今日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即

<sup>48</sup> 見劉若愚：《酌中志》，《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鐘鼓司〉，頁24下；錢曾：《讀書敏求記》，《叢書集成》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卷三〈鞏珍《西洋番國志》一卷〉，頁71。

<sup>49</sup> 〈奉天命三保下西洋〉雜劇今見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上海：涵芬樓據萬曆趙琦美脈望館抄校內府本影印，1941年），第二十五冊。解題見氏撰《雜劇提要》一百九，頁47上至47下。關於趙氏抄錄內府本之〈奉天命三保下西洋〉，見孫楷第：《也是園古今雜劇考》（上海：上雜出版社，1953年），頁78，82。許雲樵曾為此雜劇作校注，題名《下西洋雜劇》，列為《南洋袖珍叢書》第六種（星洲：世界書局，1962年）。簡介見許氏撰〈弁言〉，頁1–10。最近論述見萬明：〈明內府雜劇《奉天命三保下西洋》淺探——兼及明朝人的下西洋理念〉，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六輯（2005年），頁140–51。

<sup>50</sup> 徐景昌略傳見焦竑（編輯）：《國朝獻徵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明萬曆刻本，1965年），卷五，頁一七下。蹇義、夏元吉及陳瑄傳記分別見《明史》卷一四九，頁4147–49，4150–55；卷一五三，頁4206–9；又見Ray Huang, “Chien I,” in *DMB*, vol. 1, pp. 234–36; Wang Gungwu, “Hsia Yuan-chi,” *ibid.*, pp. 531–34; E-tu Zen Sun, “Ch’en Hsuan,” *ibid.*, pp. 157–59。以上傳記均未見諸人參與鄭和下西洋活動的記載。

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當事者尚興撫髀之思乎？」所謂「東事恹恹」，表達他對倭患的嚴重關注和不安，而「何可令王、鄭二公見」云云，道出他撰寫下西洋的盛事，是希望執政者能以歷史上英雄的業績自勵，重振國威，又希望能有像鄭和與王景弘的將帥，威振海表，消除倭患。（案以上言「何可令王、鄭二公見」，將王景弘置於鄭和之前，意味前者應有較高的地位。）《西洋記》述事以《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為主要素材，又採用《西遊記》及其他說部雜著的神怪小說，誇大神化鄭和、王景弘等歷史主角，並且塑造虛構佛道神仙人物如張天師、金碧峰國師等穿插其間，以生化妙筆幻想編造神異靈怪的故事作為襯托。<sup>51</sup>

《演義》首先以第一回「孟蘭盤佛爺推諦，普陀山菩薩會神」為題，講述一連串佛祖天將降魔的神怪故事為背景，到第八回始演述永樂帝登極為太平天子，海外諸番王嚮慕來朝，然後引出張天師上奏言國璽流落西番島國，為銜命下西洋鋪路。至第十五回「碧峰圖西洋各國，朝廷選掛印將軍」，才道出劉誠意（按即太祖的機密謀臣劉基〔1311–1375〕，但事實上他不屬於永樂時代）保舉三寶太監鄭和為「征西大元帥」、而「兵部尚書」王景弘請纓為「征西副元帥」。在談到下西洋選將掛帥時，作者還特地讓永樂帝發了一通牢騷，說「枉了我朝中有九公十八侯三十六伯，……一個個貪生怕死，不肯征進西洋」。這裏無疑是羅懋登借題發揮，影射當世文武官員的無能，但如此又明顯提高鄭和、王景弘諸將帥的才能和歷史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羅懋登一開始便刻意誇大神化鄭和和王景弘。首先，他介紹王景弘為山東青州府人士，形容他「身長九尺，腰大十圍，面闊口方，肌肥骨重」，說他曾登進士第，當時任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也文也武，自願掛「征西副元帥」印從三寶太監出使西洋番國。這就徹底改變歷史上王景弘為太監的事實，把他塑造成一位有智慧識見的大臣去輔助鄭和完成大業。其次，羅懋登借金碧峰國師與聖上的對話，道出兩位元帥都是天星下凡。

<sup>51</sup> 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萬曆原刻本及三山道人新刻本俱存北京國家圖書館。簡介見莊為璣：〈論明版《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頁66–69，39。今日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據光緒七年（1881）申報館排印之上下兩冊標點本為最善。下冊載錄近人研究三篇：（附錄二）向達：〈論羅懋登著《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原載《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1929年1月10日），頁47–64；（附錄三）趙景深：〈三寶太監西洋記〉；（附錄四）趙景深：〈《西洋記》與《西洋朝貢》〉，錄自所著《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0年），頁264–95，296–300。外文著述見J.J.L. Duyvendak, “Desultory Notes on the Hsi-yang-chi,” *T'oung Pao* 42 (1953), pp. 1–35；及Roderich Ptak, *Cheng Hos Abenteuer in Drama und Roman der Ming-Zeit.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and 4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6)。關於張天師及金碧峰國師的研究，參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教》（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及黃永年：〈《西洋記》裏金碧峰的本來面目〉，載《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44–55。

他說「三寶太監」是「上界天河裏一個哈蝦蟆精轉世，……水便是他的家，故此下得海，征得番」，而「兵部尚書」則是「上界白虎星臨凡，有了這個虎將鎮壓軍門，方才個斬將奪旗，摧枯拉朽」。這一來，便奠定兩位的獨特地位和相輔相成的關係。<sup>52</sup>

羅懋登把王景弘擬為副元帥雖然不符事實，有貶抑之嫌，不過，他筆下尊稱景弘為「尚書」或「王爺」，處處表襮其遠矚高瞻的智慧和文武兼備的將才。他不獨深思熟慮，計謀多端，而且精於航海技術，擅長兵法策略，指揮若定，與鄭和配合相得益彰。這種對王景弘的崇敬，可見於《西洋記》若干回的標題，和內文擬作三寶太監對他的評語。例如第四十五回題「元帥重治爪哇國，元帥厚遇淳淋王」；第五十九回題「國師收復撒發國，元帥兵執錫蘭王」；第七十七回題「王尚書計收禪師，木骨國拜進降表」；第八十回題「番王寵任百里雁，王爺計擒百里雁」便見一斑。作者擬撰鄭和對王景弘讚頌的對白亦比比皆是。其中較顯著的如第三十六回講〈大敗咬海干〉事，引述三寶老爺說道：「王先生的大功算無遺策，果真的文武全才。」如第五十回記舟師往馬刺伽途中，前方突然出現白茫茫一片古怪的水，旋成三五里的一個大渦，如天崩地塌一般的響，鄭和不知究竟，景弘脫口說道：「這是個海眼泄水之處，其名爲『尾閭』。」顯露他對海洋水程的認識。<sup>53</sup>

又如第七十一回述「國師收銀角大仙」事，鄭和稱讚其同儕說：「王爺明見萬里之外，一言之下，果真的賢於十萬之師。」如第七十七回以「王尚書計收禪師」為題，盛道張天師對王景弘以奇謀妙計收服飛鉞禪師的嘉獎，並留下一詩為證：「好王爺，果然是：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此外，作者又試圖揄揚王景弘的文學才華，因此《西洋記》中有數處載錄他的題詩或是手撰碑銘。例如第六十一回稱他寫在古里豎立的石碣，而第七十九回又記載他在寶船經過忽魯謨（斯）時草就的幾首絕詩。這些題詩和碑銘大概出於擬撰，不過，由此烘托，羅懋登筆下的王景弘變成一位滿腹經綸，文武兼資，擅計多謀，進退有度的王佐將才。這一來，這位在歷史屈居於鄭和之下的宦官太監，在演義小說便搖身一變為登進士第的兵部尚書，成為下西洋的輔助統帥，不但提升他的地位，而且亦大大提高朝野對下西洋事業的價值觀，為近現代的全面性評估著了先鞭。<sup>54</sup>

綜合下西洋史事，雖然囿於資料，未能探蹟索隱，但是宦官的主導地位及其對和番取寶事業的貢獻是無可懷疑的。今日論下西洋事不受歷史包袱牽制，可以從多方面探討及評論其歷史或甚至時代意義，但卻不能忽視宦官的角色及其衍生的問題，否則就很難對這件中國甚至世界的盛事，作出恰當的評價，有心人士值得深思。

<sup>52</sup>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三，頁 192-96；卷四，頁 206-8。

<sup>53</sup> 同上注，卷八，頁 464；卷一〇，頁 642。

<sup>54</sup> 同上注，卷一五，頁 918-19；卷一六，頁 991；卷一三，頁 792；卷一六，頁 1012-14。

# The Eunuch Connection: Some Reflections on Zheng He's Maritime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Oceans, 1405–1433

(A Summary)

Chan Hok-lam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Ming eunuchs under Emperor Yongle and Emperor Xuande and the dispatch of the “treasure ships” in seven epochal maritime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oceans under the command of admiral Zheng He and his associate Wang Jinghong during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Despite a profusion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on diverse aspects of these spectacular voyages, almost none investigate the role played by the eunuchs of the inner court familiar with seafaring. This oversight was eviden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since Zheng He and his associates were mostly eunuchs, it was assumed that their activities had already bespoken the eunuch contributions. Moreover, there are few sources that expose the working of the eunuchs in the initi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expeditions.

In several interrelated issues, the author seeks to demonstrate how the court eunuchs, having won their master's confidence and acquired unchecked power, planned and managed the expeditions to fulfil the ambition and desire of the emperor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outsiders. The secrecy of their missions, that they masterminded the operation in the emperor's name and communicated the outcomes only to the emperor and not to the governmental bureaucracies, accounted for many gaps of informa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voyages, including the dates of departure and return, the objectives and results of the voyages in the official records. Seen in this light, the contention reported in late Ming works such as Yang Zongjian's *Shuyue zhoushilu* or Gu Qiyuan's *Kezuo zuiyu* that the dearth of official records on these missions was caused by destruction of the archives by later scholar-officials who had decried the extravagant costs of the maritime expeditions and their futility to the national cause could not be valid. The deliberate low-key reporting of these episodes in the *Taizong shilu*, the reign records of the Yongle emperor, by official compilers under Xuanzong who sought to deflect criticisms that these treasure seeking maritime adventures and bellicose attitude toward the foreign states to enforce the tributary system violated the *ancestral injunctions* laid down by the dynastic founder Taizu further obscured their real intentions.

The last part of the essay re-evaluates the historical and recently availabl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and career of both Zheng He and Wang Jinghong, in particular on how they became eunuch and rose to pre-eminence

by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guards of the future Yongle emperor and campaigning on his behalf in the usurpation of the throne. In the case of Zheng He,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his Muslim nobility ancestry in Yunnan since the Mongol era, the origin of his surname Zheng, dates of birth and death, whether or not his remains were brought home for burial after his death in Calicut, and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ites of his grave in different locales in Nanjing. In the case of Wang Jingzhong, it introduces solid evidence that his original name was Wang Kuitong, the name “Jingzhong” was invested by Emperor Renzong and was used in the *Taizu shilu* and subsequent official records; it also examines his seafaring background in Fujian and his career as chief eunuch and commander of the maritime voyages together with Zheng He. It is argued that he was not subordinate to Zheng He but was in fact a co-commander of the armada by contributing hi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navigation. It is significant that he was given a higher profile than Zheng He i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novel of the maritime voyages *Sanbao taijian Xiyangji tongsu yanyi* by Luo Maodeng who wrote this work to showcase the might of Chinese sea power in the waning days of the Ming dynasty.

關鍵詞：宦官 西洋 鄭和 王景弘 王貴通

**Keywords:** eunuchs, Western oceans, Zheng He, Wang Jinghong, Wang Guitong